

新中国成立初期 苏联的“一个中国”外交立场

(江苏) 吴跃农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 “本政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 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日, 周恩来把毛泽东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及他签发的表达与各国建交愿望的外交部公函迅速送达各国政府。

国际社会极为关注新中国外交动向并在思考与新中国未来的关系。英国《卫报》称: “1日(指1949年10月1日。编者注)是亚洲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法新社电稿指出: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宣言(指毛泽东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编者注)已由新共和国外长周恩来送达外国政府。”该电稿还节选了周恩来签发的外交部公函中的一段话: “我认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当时, 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重要问题是, 未来究竟该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代表还是新的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 苏联政府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周恩来外长照会。照会指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公告, 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建议之后, 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 并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 故特通知阁下: 苏联政府决定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并互派大使。”同日, 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向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代办发表声明, 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 并召回其外交代表。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

10月3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听取周恩来关于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苏建交的报告; 研究苏联政府同原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立场, 决定同意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任命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首任大使。会议同意外交部发出声明, 通知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 一律停止活动, 听候交接。当日, 周恩来复电葛罗米柯, 欢迎中苏两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 并互派大使。对苏联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 表示欢迎。

在两国外交部互换照会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后, 苏联政府外交部任命原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 中国政府外交部任命戈宝权为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周恩来当天下午即会见了齐赫文斯基。



1949年10月3日，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图为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中方递交国书后与中方人员合影

苏联承认新中国的消息在国际社会引发剧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均报道了苏联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英国方面表示，由于“苏联与中共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使得英国有必要重新考虑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英国不想草率行事”。而美国方面认为，“华盛顿关注承认的问题”，但是“不急于行动”。在苏联的带动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同新中国建交。至1949年底，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0个，粉碎了当时西方某些敌对势力和蒋介石集团试图依靠美国孤立新中国的图谋。

接管国民党驻苏大使馆、领事馆

戈宝权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1935年起担任天津《大公报》记者，留驻苏联3年，回国后先后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担任编辑，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翻译过《普希金诗集》《海燕》等，毛泽东称赞他为“俄国文学专家”。1949年7月，陪同刘少奇访问苏联后留在当地。

10月4日，周恩来电示戈宝权，要他立即向莫斯科原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代发布命令，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派遣大使来莫斯科，并将派领事至苏联各地，接管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你及原国民党政府驻

苏大使和驻苏各地领事馆的一切工作人员，必须负责保管中国大使馆与各领事馆的档案、文件和一切财产，安心听候接管。为了祖国利益，我认为你应当这样做，如有破坏或迁移行为，中央人民政府当追究责任，并予以法办。中央人民政府现已任命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参赞，并兼临时代办，并责成戈宝权代办即日前往中国驻苏大使馆洽商保管和接收事宜。”

实际上，新中国接管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早在1949年7月就展开了。7月底，随中共代表团访苏后，王稼祥留在苏联治病。他一边治病，一边领导随团的戈宝权、徐介藩和几位机要人员着手接收和清理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这时，国民党大使蒋廷黻及使馆人员已离开苏联逃到欧洲。戈宝权、徐介藩等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工作，这些人后来都留在大使馆工作。

10月4日，周恩来给王稼祥发电报，同意在苏联设立海参崴、赤塔和阿拉木图3个领事馆，接管领事馆的工作也同时展开。这些工作都是在苏联的大力协作和默契配合下进行的。

中苏互派大使

1949年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10月10日，周恩来与董必武、郭沫若、聂荣臻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首都3000余名群众参加了这一活动。周恩来在致祝词时指出，中苏两国的邦交，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后经过罗申大使的努力，将会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16日，毛泽东接受罗申递交国书并在致答词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

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我相信，经过贵大使的努力，贵我两国的合作，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10月20日晚，毛泽东设宴欢迎罗申。宴会结束后，王稼祥率相关人员乘专车离京赴苏上任。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领导人，北京市各界群众代表100余人及罗申前往火车站送行。临行前，周恩来叮嘱王稼祥：“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太大，是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国外交工作的发展。”

10月31日清晨，王稼祥一行11人抵达莫斯科。在车站受到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波波夫、莫斯科军区司令员阿尔捷米耶夫上将、莫斯科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苏联党政军官员，以及朝鲜、蒙古、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保加利亚等国驻苏使节和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戈宝权等人的欢迎。王稼祥在站台发表演讲：“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驻外国代表并于现在到达贵国首都，感到非常荣幸。我代表中国政府对苏联立即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表示感谢，将尽最大努力来巩固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

王稼祥还带着毛泽东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予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致以同志敬礼！”

11月3日中午，王稼祥率领大使馆参赞

曾涌泉、戈宝权、徐介藩和武官边章五、一等秘书张观前往克里姆林宫。下午1时，呈递国书典礼正式开始。苏方在场的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高尔金、外交部副部长拉弗伦捷夫、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库尔久柯夫、交际司代理司长布舒耶夫、远东司一等秘书达克鲁杰柯夫等，经布舒耶夫介绍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后，王稼祥宣读祝词，递交国书。

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依然占据着联合国席位。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苏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合作，作出不懈努力。

1950年1月7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王稼祥陪同下拜访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建议我外交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发一个声明，否认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中国发表声明后，苏联将采取行动，即如果蒋廷黻还留



1949年11月3日，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向苏方递交国书后与苏方人员合影

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则苏联会拒绝出席安理会。毛泽东当即表示，中国外交部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

当天下午，毛泽东给周恩来发电报，其中指出：“请你们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九日恩来动身来莫斯科前发出此声明的电文，

除已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外，并以电报通知苏、英、美、法等国外交部。此事办理情形望告，并告以一月九日是否来得及发出。”当晚12时（国内已经是1月8日早晨5点），毛泽东亲自起草好致联合国声明文件，又致电刘少奇、周恩来：“兹拟就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十会员国政府的声明电文，请照此发去为盼。”

1月8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声明电文发布后，苏联即向联合国提案驱逐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代表。1月13日，安理会表决苏联提案，但在美国操纵下，提案被否决。苏联表示，既然安理会本身存在不合法的、苏联不再外交承认的国民党政权的代表，那么它所通过的任何决定，苏联将不承认其为合法，也不参与其工作。苏联代表随即宣布退出安理会。1月16日，苏联与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又从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程序委员会、防止歧视与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和无国籍者及有关问题特别委员会3个机构中退出，以示对蒋介石集团窃占联合国席位的抗议。

苏联反对国民党集团参与联合国组织及所属机构，这样的行动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力支持。这就迫使联合国关注中国代表权问题，秘书长赖伊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斡旋，使安理会能够正常运转。

3月8日，赖伊以联合国秘书长身份向安理会各成员国印发关于新中国席位问题的法律备忘录并向媒体公布。此备忘录基本观点是：当一个革命政府对抗现有政府而自称代表某一国家时，我们要搞清楚的问题应该是，究竟这两个政府中哪个事实上具有使用国家资源去指导人民履行成员国义务的地位，需要判别的主要标准是新政府是否能在其领

土范围内行使有效权力，并为本国人民所服从。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联合国各机构就应该通过集体行动给予该政府以联合国代表本国的权利，即使某些成员国无理由根据其国家政策拒绝承认，并坚持否认其为合法的政府。显然，赖伊倾向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联合国代表。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也认为，赖伊的这份备忘录无疑是联合国动摇对国民党政权代表支持的强烈信号，事实上是主张接纳中共代表团取代中华民国代表团。

4月22日至5月中旬，赖伊先后访问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进一步就中国代表权及联合国各常任理事国等问题，进行积极斡旋。5月1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赖伊。苏联方面明确表示，苏联在联合国及各种机构的原则立场，即凡是有国民党集团非法代表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的那些机构，苏联代表不参与其工作。

5月16日中午，王稼祥应邀与赖伊会谈。赖伊表示，自己一向尽力使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各种会议，目前虽然尚未成功，但希望今夏能解决此问题。赖伊对王稼祥说，他收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电报，正竭尽全力以求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针对当时国民党放弃派代表参加红十字会一事，赖伊建议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利用此次机会派出自己的代表，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尽快完成与英国建交的谈判，一旦完成谈判，则会对解决联合国中的中国问题产生有利影响。赖伊的外交斡旋缓和了苏联与其他常任理事国的关系，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阻力也大大减少。

从1949年10月至1951年5月，新中国先后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等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迈出了打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

（责编 张晓兰）